

从政治认识到政治认识论

——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论析

金林南^{1 2}

(1.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2.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政治认识论兼有哲学认识论的反思性特质,是政治知识的知识,主要关注政治思维方式。对中国近现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历史性论述表明,尽管遭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扭曲,中国近现代以来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表面到内核、从片面到完整、从感性直观到理性反思的上升过程。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景”理论提示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认知应实现从政治认识到政治认识论的范式转换。

关键词 政治认识 政治认识论 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维特根斯坦

中图分类号:D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7)04-0012-06

一、政治知识的知识 ——政治认识论的知识特质

政治认识论以政治认识为研究对象,是政治认识的认识或政治知识的知识。显然,政治认识早就有了,但关于政治认识的认识要迟于政治认识,正如吃饭早就出现了,但把吃饭作为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却是人类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当然,以政治认识为对象的认识和以吃饭或其他活动为对象的认识活动具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政治认识中,政治认识主体与政治认识对象处于极为复杂的纠缠关系中,政治认识主体既是政治现象的认识者,又可能是当下政治实践的参与者,也许永远找不到一位完全摆脱政治实践纠缠的纯粹政治认识者。德国著名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在剖析人类理性能否认识人类社会行为时说:“政治行为在本质上不同于人类任何其他类型的经验,在对其作理性理解的道路上存在的障碍比其他知识领域内的障碍更难于克服。”^[1]更令人沮丧的是,由于政治世界的复杂多变,尤其是政治实践与政治认识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对政治认识的认识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政治认识,难以摆脱与政治世界的纠缠,这将会构成一个解释学意义上的“无限后退”,从而导致政治认识论的不可能!因此,这里提出了一个对政治认识论研究性命攸关的问题:既然政治认识被认为可能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认为关于政治认识的认识——政治认识论

也是一种政治活动?

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在《柏拉图全集·卡尔米德》篇中讨论“节制”时,明确提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知识——“自我认识”,这种知识既是关于它自身的知识,同时又是关于无知或缺乏知识的知识。这种知识就如同人的眼睛中的瞳孔一样,可以通过它照见自己,这是视觉中最完善的地方。这是一种智慧,是唯一的一门关于它自身和其他学问的学问^[2]。尽管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关于这种“知识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最后结论似乎是悲观的,但却揭示了认识论的思维特质:反思性。

按照倪梁康先生的意见,“反思意识”是区别于“对象意识”、“自身意识”的一种意识形式;“对象意识”是一种“最常见的直向的意识方式”,例如看见一棵树,它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自身意识”则是指“一种与对象意识的进行同时发生的、对此活动本身的觉晓方式”,例如在看这棵树时,看的行为同时也被看者本人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而“反思意识”是“一种回顾的意识方式”,例如对刚才看见树的看之行为的反思,它不是一种“原本意识”,而属于“再造”的行为^[3]。显然,反思是一种把思本身作为对象的思考,是一种必须返回到自身的思,它凸显了作为思的反思性以及作为思者的身位意识。

经由苏格拉底阐发而声名千古的德尔斐神喻“认识你自己”是对认识论反思性特征的最典型概括,它表明人类意识的真正觉醒。在认识论领域,这

种反思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对认识对象的沉思,对认识过程、形式、机制、结果等认识活动本身的自觉,最为重要的是,认识论的反思性不断对认识者自身的位置与认识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追问。因此,认识论的精髓恰恰是对自己的追问,尽管关于这个主题的提问方式、基本内容和发展线索等在不同时代都有所不同,但是“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为一切科学陈述找到一个绝对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种努力在今天还广泛地进行着,只不过现在是有多少种哲学的基本观点,就有多少个寻求知识最根本基础的方向”^[4]。所以,认识论问题一向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理性的基本主题之一。

政治认识论是一般认识论的一个分支^①,认识论的反思性使政治认识论不断对政治认识的对象、方式、内容、结果和政治认识者在政治认识中所处的身位进行反思性审查,这种反思性审查的一个根本方向或目标就是为理解政治认识寻找到一个比较合理有效的视界。因此,如果说政治认识具有直观性,是认识主体直接面对政治现象的一种活动,那么政治认识论就是对这项活动本身的认识。政治认识所达致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哲学等,政治认识论的一项内容就是对这些结果进行思考。简单地说,政治认识论的主题是政治思维方式。理性的历史发展表明:理性认识所追求的知识结论的标准也许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理性对自身的返照从来没有放弃过。既然政治认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类理性就应该能够对这种客观对象进行有效揭示。当然,由于政治认识所具有的复杂性,对它的揭示肯定不同于其他认识论形态,比如与自然科学认识论相比,政治认识论显然要复杂得多。何况身处具有独特思维传统的东方文明的我们要合理有效地揭示西方文明的政治思维方式,所要克服的障碍更是非常之多。

二、在理性自觉与意识形态之间 ——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历史进程疏解

中国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认识是与西方对中国逐步升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入渗透纠缠在一起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形成的关于中西文化的持久探索,其实质几乎可以说是一场政治讨论,一场关于社会制度的讨论,一场关于中国国家和民族命运之抉择的讨论。^{[5][6]}同时,中国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认

识也深受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对西方政治思维的关心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1. 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肇始

在中国近代化的早期阶段,西方政治事物还没有进入中国知识界的“法眼”,无论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曾国藩等人的“洋务运动”,其着眼点都是尝试学习西方的军事、经济技术以强国。当然,也有个别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西之间的落后原因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冯桂芬在《校庐抗议·制洋器议》中就曾对中西比较作出著名论断:“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6]冯桂芬的论断开始把寻找中西差异的目光转向“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政治层面,尽管没有作出进一步的探讨,但却是知识界对西方政治文明认识的开端。郭嵩焘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西方政治认识:“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7]但是,总体来说,当时的西方政治认识基本属于实务知识层面,对政治思想几乎不关注。我国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对此这样总结:“中西接触,自道光间已开始频繁,而士大夫所见者,外国船炮之坚利而已,外洋器物之精绝而已,所言者洋务而已,富强而已。迄于光绪甲午以前,五十年间,甚少畅论民主者,当然介绍西政者有之,抒变法之见者有之,但其直伸民主、民权之义者则极为罕见……光绪甲午以前之介绍西政者,类皆云西方之政本如何,教化如何,即使屡谈议院,而多止于介绍,并无所取法,然已较泛谈洋务者大有进境。甲午以前之言变法者,虽谓取借西法,而及于取法民主政治者则极少,所谓取法者,则只建铁路、兴矿务、练洋操、办学堂等事,于政治制度绝少变革之论,然已较泛谈自强者要具体得多。”^[8]

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期间,我国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进入肇始阶段,产生了第一批西方政治思想的翻译家及其作品。据统计,1901~1904年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多达66种^[9]。其中,对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先生,他开创了中国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传统,是第一位系统翻译西方政治思想论著的人。严复于1896~1909年间共译出了8部西方思想名著,计170多万字,涉及政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逻辑学、经济学等6个领域^[10]。

①一般认识论是对认识论理论的总体称谓,是指关于人类认识的理论,不同时代拥有不同的形态。在中古时代,认识论是裹挟在哲学(神学)本体论中的,真正自觉意义上的认识论是在近代产生的,随着心理学、现代逻辑学等具体科学的发展,现当代认识论发生了分化:一部分遁入经验科学领域,形成认知科学、脑科学、智能科学等现代学科;另一部分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领域,形成为知识论哲学,它依然保留哲学思维应有的反思性、一般性特征,留有哲学认识论的痕迹。

在这些翻译作品中,赫胥黎的《天演论》与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论自由》)最为著名。通过《天演论》而受到传播的进化论思想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人认识政治世界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穆勒名学》以介绍英国经验论、归纳法为宗旨,批判中国传统先验论,试图在方法论、思维方式层面引进西方文化;就眼光和水平说,在七八十年前确是凤毛麟角,极为难得^{[11] 264}。实际上,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在思维领域学习西方的看法依然显得难能可贵!《群己权界论》的影响要复杂一些,李泽厚先生这样评价:如果说,严复在介绍西学中客观上起了最大效果的,是世界观(天演)和方法论(逻辑),对后人影响甚巨的话,那末,严复主观上想搬到中国来的更为现实的救国之道——以英国为榜样的欧洲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却非常遗憾地毫无反响^{[11] 269}。这样的判定对于广大民众的政治观念及当时的政治实践来说可能有效,但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论断就有失公允了,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人都通过不同方式表明自己受到该书的影响^{[10] 125-131}。

另外,严复开始自觉反思西方政治认识的方法论视角和价值观立场。他第一次尝试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摆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评判,不预先设定优劣框架,将中西文化的各种特点先列举出来,然后再作出评价,这应该说是“中体西用论”的一个突破。在价值立场上,严复被称为“激进文化观”代表,他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明确肯定了西方文化比中国固有文化的优越性^{[5] 258-268}。

当然,由于严复所处的时代是“古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时期,对西方政治的认识必然受当时所处的政治情境制约,尽管他首倡“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但却很难真正做到。以《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为例,严复本着救亡图存的心态和启蒙思想者的意识,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译介多有“加、减、改、案”,采取多种方式“摄取”以回应当时的政治情境^{[5] 38-63, 87-122}。因此,正如丛日云先生所说:“这个时期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和研究属于整个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当时激烈的政治变革的一部分。人们对待西方政治思想的态度是应己之需,为己所用,采取不分青红皂白的拿来主义,故难免囫圇吞枣,浅薄粗率。受到注意的主要是西方近代各家各派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其与国内政治现实相呼应的部分,以及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心理需要能够产生共鸣的内容”^{[12] 213}。

2. 学术化研究的奠定——民国时代的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实现西方政治思想学术化研究的是民国时代,

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知识化、学术化、国际化程度得到很大提升,这个阶段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事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是一群现代意义上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严格的西方政治学学术训练,与西方政治思想界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为例,一方面,广泛邀请美国政治学者前来讲学,这些学者在当时美国的政治学界基本都属于名列前茅的知名人士。索密特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从1900年到1945年这一期间对于政治学的贡献最为卓著的政治学者”中,曾经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的克尔文和莱特分别名列第五和第九^{[13] 235-236}。另一方面,当时清华大学的学术休假制度能够保证教师前往欧美学术机构从事学术研究。这些学术活动和学术制度使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并能够在当时的世界政治学理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以《中国政治思想史》而闻名的萧公权先生以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在海外政治学界获得很高认同,该书于1927年由伦敦一家著名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之后,“佳评如潮”,《伦敦时报文学副刊》于1927年12月1日评论道:“此书虽由一位中国学者所写,而其论证与语气全是欧式的”,并认为“萧教授的英文和他的西方思想一样地道”。萧公权在该书中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当时颇具名望的政治思想史家拉斯基也在《新共和》上发表评论,深佩“此书才力与魅力均巨”,认为是五年来论述政治思想的最佳著作^[14]。

第二,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者栖身课堂,似乎与当时的政治实践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当然,这些专业学者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中国当时的政治情境也不可能让他们获得这样的境界。萧公权先生在谈论自己给当时的政治性评论刊物《独立评论》撰稿时说:“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立志不做‘官’,专求‘学’,这个志愿我始终不曾放弃。”“我虽不从政,不入党,但对于国家的前途并非漠不关心。从二十一年任教清华大学起,教课的经验 and 教材的收集都颇有增进,不必像从前一样,要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教学上面,而可以有时间去对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加以考虑……发行《独立评论》周刊……我也应邀撰写,追随他们之后,小尽‘书生报国’的责任。”我立言的宗旨是很简单的:把平日学思所得有关国家社会进步的意见提出供政府和国人的参考。所见未必有是,但所知无不尽言。^{[13] 306-307}从中可以体会到一种因学术理性而来的平和心境。

第三,对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具有一定

的自觉性。著名西方政治思想史家、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浦薛凤在其《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序言“中阐明自己的方法论时说：“著者自始即抱持一项标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研读昔贤之原著，亲自咀嚼消化，然后扼要详述。在消极方面言之，即不愿偷懒取巧从西方政治思想史诸学者之撰著中间摘录拼凑”，“关于叙述，著者力求客观，偶有评论亦一本政治学之立场。诚以用一时代流行见解一以贯之殊是发挥政治思想而非叙述政治思想史”^{〔13〕}179-180。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已经采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来处理西方政治知识，表明中国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已经具备国际视野。

3. 意识形态阴霾及其消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1952年的大学院系大调整使独立的政治学在学科建制上暂时退出中国内地学术舞台。新中国刚成立，在很多方面都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包括大学的办学体制和学术模式。而当时苏联承受的是欧洲大陆学术模式，政治学在这个学术模式中还没有获得独立学科地位。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这些国家不是不研究，而是把政治问题都放到国家学和法学中去了^{〔15〕}。因此，在照搬前苏联学术模式下，西方政治思想史在我国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放在法律系开设。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与冷冻，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全国很多高校又重新设立政治学系，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到1964年春天，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又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3个政治学系改成了3个国际政治系，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员^{〔16〕}。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即使是充满“左倾”意识形态的政治学研究也几乎完全停顿，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真正进入空白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阶段可以被称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最好时期，无论是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是研究方法的改进等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和丰富：

第一，西方政治认识在研究资料、学科建制、人员队伍、对外交流等方面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经过近30年的努力，已经出版了众多的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哲学等方面的译著，其范围遍及各种类型。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再度在中国得到认可，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也找到了自己的学科归属。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科点或学科方向在很多硕士、博士点都获得了布局，培养的专业人才也较为可观。由于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很多从事西方政治思

想的研究人员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出国访学、攻读学位、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等，大大提高了我国西方政治认识的国际化程度，国际上关于西方政治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也都能比较快地得到介绍。

第二，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在方法论和内涵方面获得了很大突破，并已具备相当的学术自觉性。丛日云先生说：“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导理念发生了巨大转折。这也许是20年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成就。”^{〔12〕}12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理论研究的价值立场上逐渐摆脱极端意识形态的纠缠，人们逐渐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学术观点的冲突与社会上的政治斗争既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淡化了学术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色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那种僵硬的定性、戴帽、站队的做法已经很少见到了。学者们开始客观评价西方各派政治思想，深入挖掘西方政治思想作为人类认识政治现象的价值；一些学者还通过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发现其作为认识中国政治文化参照系的价值等。

其次，逐渐摆脱西方哲学史、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探索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自己的学术方法论。在政治学学科地位刚刚恢复时期，由于“左倾”意识形态的牵伴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资料的短缺，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视野非常狭窄，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阐述往往借助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路径，例如以哲学领域的两分法（唯物论和唯心论）作为最基本的评价标准，以此阐述、分析、评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家。另外，西方政治思想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成为阐述的重点，并且很“自觉”地在这些社会状况中“推断”出某种政治思想或某位政治思想家的政治立场或阶级属性。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这种研究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开始探索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体现这种学术努力的学术成果开始涌现，例如由徐大同先生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以及由其总主编的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就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与尝试。徐大同及其研究团队认为，政治思想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按照西方政治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确立的政治观；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几个阶段。^{〔17〕}7-8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特点主要有三：由抽象理性思维向实证理性思维演变的过程；由着重关注政治制度向着关注政府运作转变的过程；它的历史发展线索是“变

中有不变’^{①18]}。这些学术成果开始自觉进入到西方政治文明的内核中去,以自己的方式揭示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最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内容越来越深化、丰富与生动,能够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及社会情境产生互动效应。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群体通过学术理性的方式传播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成为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文化的参与者、塑造者。尽管绝大多数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者属于学院内的专业知识分子,但是他们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应有的公共责任,以专业知识分子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去,通过自己的言行塑造健康理性的公共精神。西方政治文明中的理性、平等、法治、宽容等价值观正逐渐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并通过这些学者的教学研究、著书立说、社会活动等方式不断传播开来,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构建新型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论背景和意识支援。

当然,当代中国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还有不足之处:其一,解读方法论上新的“贴标签”现象。尽管阶级分析意义上的贴标签解读模式基本退出学术舞台,但新的贴标签方式又出现了,对一些政治思想家及其政治思想的解读往往预先设定了一些解读框框,比如说他们属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以这些解读对象与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远近亲疏来审定他们,放弃了对这些思想家、理论思潮作内在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评判。这种新的“贴标签”方式也许对我们理解西方现当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立场有帮助,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到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和思维深度。并且,由于这种新的“贴标签”方式本身主要来自西方现当代政治思潮相互竞争的产物,更多反映了西方现当代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关怀,以这种标准来解读西方政治文明很可能遮蔽西方政治理性的内在联系和历史深度。例如当代有些西方政治思想史家把马克思主义归类为是一种“对自由主义的反动”,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对西方历史上乌托邦传统或激进主义的现代继承而已,有的甚至仅仅把马克思主义视作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这样的界定完全丧失了西方政治理性的历史维度,只是站在现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论立场所作的肤浅判定^①。

其二,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依然局限于西

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经典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潮。不可否认,对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具有很强社会历史效应的政治思潮的认识能够对我们理解西方政治文明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可以使我们更方便地领会西方政治文明的典型特征,也可以使我们更“合理地”对西方政治文明作出“同心圆的描述”。但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②19]}在福柯看来,过去的思想史总是试图对一种思想观念作目的论式的解读,使思想史中存在的断裂和非连续性被删掉,使之看上去具有一个“全面历史的主题”。而在福柯看来,思想发展中最真的东西,恰恰是话语的断裂和非连续性,是理论逻辑中独特的异质性。这里绝对不是要否认西方经典思想家及其理论思潮对我们认识西方政治文明的作用,而是要理性地认识到过度偏重带来的局限。它可能使我们忽视包括常识在内的非经典所具有的文化底色或基石作用,使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理解陷于单调、狭隘,把活生生的政治世界过滤为由经典作家构成的抽象理论和原则。

三、从政治认识到政治认识论 ——认知西方政治文明应有范式思考

对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历史的论述表明,中国近现代以来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表面到内核、从片面到完整、从简单直观到理性反思的上升过程,这符合对文明的认识规律,因为文明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存在,它既有鲜明的外壳,也有深层结构,并且由后者提供给前者“根据和框架”。我们可以借助于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景”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世界类似于一条在时间中流淌的河流,“那条河流的岸边一部分是不发生变化或者变化小得令人察觉不到的坚硬的岩石,另一部分是随时随地被水冲走或者淤积下来的泥沙”^{③20]}¹⁸,那些坚硬的岩石构成了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世界图景,是我们思想的“河床”;“描述这幅世界图景的命题也许是一种神话的一部分,其功用类似于一种游戏的规则。这种游戏可从全靠实践而不是靠任何明确的规则学会。”^{④20]}¹⁷河流中那些“随时随地被水冲走或者淤积下来的泥沙”就构成了

①非常有趣的是,主张进行“字里行间”式阅读古典著作的施特劳斯学派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时更具历史感,尽管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存在不是马克思的预言正确的标志,而是马克思引以为基础的乐观的历史主义不正确的标志”,但是他们对马克思的解读是以整个西方理性传统为背景的,即以非现代性视角进行解读。参见 ①约瑟夫·克罗波西卡尔·马克思《第三十四章》[C]/施特劳斯,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册》[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926-953;②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C]/丁耘,译,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86-101。

我们能够用认识等方式领会得到的经验世界,它们以一般经验命题的形式出现。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的河床可能移动。但是我却分辨出河床上的河流运动与河床本身的移动,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①9 118}作为“河床”的世界图景“把形式赋予了我们的观察和我们的研究。也许它们曾受到质疑。但是也许由于经历了久远得不可想象的年代,它们已经属于我们思想的框架。^{①9 135}

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景理论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西方政治文明一定具有自身独特蕴涵的“世界图景”或“河床”,但迄今为止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能够看得见的、流动变化比较明显的河流层面,对包括政治思维方式在内的河床可能所知不多。因此,我们可以把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认知拆解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政治认识层次,在这个层次,西方政治文明被视作是与我们具有利益竞争关系的对手,而且它经常能够战胜我们,它的存在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必须要“立竿见影”地向它学习,使我们能度过生存危机。这一层次的西方政治认识必定具有直观性和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它不可能深入到西方政治文明“河床”。

另一个是政治认识论层次。在这一层次,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认知带有因反思而来的平和与深入,因为:一方面,我们能够在认识西方政治文明时带着自己的相对客观的身位意识,我们理解自己与西方文明之间所处的位置关系,这样使彼此的政治价值观尽可能地获得客观完整的展示,从而消除了很多在第一个层次存在的意气用事;另一方面,我们能深入到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领域,尤其是通过对西方政治认识众多成果的理解,能够深入了解西方人的政治思维方式,使我们能够真正有能力与条件做到“同情”地理解西方政治文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使我们与西方政治文明的关系从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第一层次深化到第二个层次——政治认识论。只有在这个层次,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理解才能更宽容、更客观、更科学,对构建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才更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1.
[2]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50-167.
[3]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6-21.
[4]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册[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4.

[5] 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6.
[6] 冯桂芬.校庐抗议·制洋器议[M].光绪戊戌本.
[7]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42.
[8]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0-191.
[9] 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百年回眸[N].人民日报,2000-12-28(12).
[10] 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1]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12] 丛日云.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历程[C]//马德普.政治文化论丛:第1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13]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M].北京:三联书店,2005:235-236.
[14] 汪荣祖.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M]//萧公权.宪政与民主(附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96-197.
[15] 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32-147.
[16] 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J].东南学术,2000(2):39-44.
[17]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7-8.
[18]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总序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
[19]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7.
[20] 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M].张金言,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